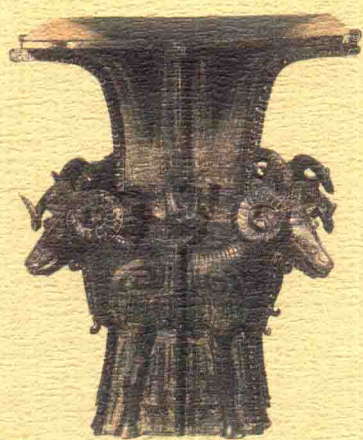


伍新福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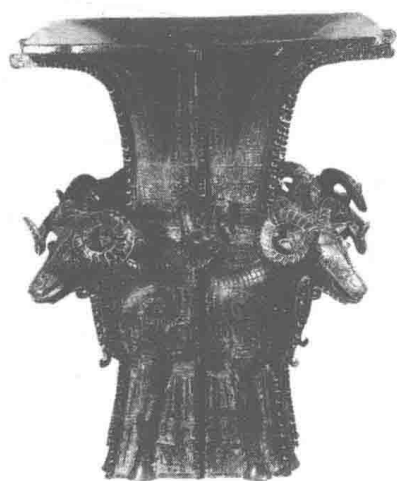
湖南文化史



岳麓書社

伍新福 著

湖南文化史



岳麓書社 · 长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南文化史/伍新福著. —长沙:岳麓书社, 2016. 12

ISBN 978-7-5538-0553-5

I. ①湖... II. ①伍... III. ①文化史—湖南省

IV. ①K29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10942 号

HUNAN WENHUASHI

湖南文化史

作 者:伍新福

责任编辑:刘 文

责任校对:舒 舍

封面设计:胡 颖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直销电话:0731—88804152 88885616

邮编:410006

岳麓书社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1000 1/16

印张:48.75

字数:820 千字

ISBN 978-7-5538-0553-5

定价:168.00 元

承印: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84129



湖南省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
湖南省湘学研究院系列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伍新福,湖南省凤凰县人,生于1935年10月,苗族。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史学研究员、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先后执教于母校历史系、湘潭大学政治系和历史系,后调省社科院。主攻中国苗族史和湖南地方史,出版学术专著《中国苗族通史》《苗族史》《苗族文化史》《湖南民族关系史》等10余部,在中央和地方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

序 言

几千年来，湖南境内各民族彼此交融，共同创造了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中一支颇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湖南文化。全面、系统地梳理、研究这一地域文化的发展演变史，揭示其不同历史阶段的表现特色与成就，总结其发展变化规律，对于加深对湖南历史文化的了解，弘扬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促进当代湖南的文化建设，均不无裨益。

一

湖南文化，源远流长，早在距今 20 多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湖南境内就已有人类活动。西周末年到春秋战国时代，楚国兴起于南方，湖南被逐步纳入楚国的版图。长沙楚墓出土的楚帛书、帛画等，均充分显示了当时湖南境内文化的高度发达。秦汉以降，随着国家大一统局面的开创和发展，湖南文化开始了与中原文化的交流、融合。中唐以后，湖南出现了著名的流寓文学，产生怀素、欧阳询等书法家。两宋时期，湖南成为理学的发源地，以胡安国、胡宏父子为代表的湖湘学派是当时一支重要的地方理学派别，创办的岳麓书院后来发展成为全国四大书院之一。明清时期，湖南文化进一步发展，并逐步形成了以经世致用为特色的湘学。

19 世纪中叶以后，湖南文化出现了新的发展高峰，它以陶澍、魏源开其端，以曾国藩、罗泽南等湘军将领继其后，使湖南文化的影响力大为扩大。此后以谭嗣同、唐才常等为代表的湖南维新人才群体，以黄兴、宋教仁等为代表的湖南资产阶级革命派人才群体，以毛泽东、刘少奇等为代表的湖南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才群体，承前启后，将湖南人的精神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同时，也将湖南文化的张力发展到新的高峰，形成了“一本湘人奋斗篇，半部中国近代史”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研究。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学术界已有的关于湖南文化史的研究,尚十分单薄,主要还是将视角集中在近代,也即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对于湖南这一独特的地域文化之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和历史规律,则研究的还很不够。对这个历史过程进行系统梳理,不仅有益于对湖南文化史本身的研究,也有助于学术界在此基础上开展对湖南地方史其他方面的研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伍新福老先生的这部新作《湖南文化史》,不仅是湘学和湖南地方文化史研究领域内的填补空白之作,也是值得研究湘学和湖南地方史学者重视的一部力作。

二

该书内容上起原始社会,下迄1911年辛亥革命,系统梳理了湖南地域文化史发生、发展、演变的全部过程,全面阐述了它在古代、近代各方面的成就,涵盖文学艺术、教育与人才、科技工艺、经学理学、史学地学、哲学与社会思潮、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等诸多领域,不仅重点阐述了以汉民族为主要载体和具有湖南地区特色的中华传统文化,还尽可能发掘和介绍了土家、苗、瑶、侗等湖南各土著少数民族特有的民族文化,在全面记述历代湖湘文化精英在各文化领域的成就和建树之外,还着力搜集和记述了民间和社会大众在文化领域内的创作和传承。诸如民间口头文学与民间工艺、民间信仰崇拜、生活习俗与民族风情等内容,在书中占有相当的篇幅。全书在文字叙述之余,还选配了100多幅文物和历代书画、碑刻作品图片,可说是一部图文并茂、学术性与可读性兼顾的佳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广征博引,通过运用各类历史文献、各种考古资料 and 口述史料,钩沉发微,审慎考辨和研究,不仅系统梳理了湖南文化史的源流、演变,还对学术界过去一些存在谬误的观点进行了厘清。比如“潇湘”一词,一般皆以其为湖南的地域性简称,经伍老考证,认为此二字乃是古代对湘江的一种美誉,称赞湘江之水特别清澈。这些考证和分析,对于正确认识和了解古代湖南的有关文化与习俗,均不无裨益。

三

伍老早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先后在湖南师范学院、湘潭大学等

校任教，1980年调省社会科学院后，曾任历史研究所所长，并兼任中国史学会、中国民族史学会理事，湖南省历史学会理事长和苗学学会会长等多个学术职务。

在历史研究所工作期间，伍老在湖南地方史，尤其是苗族史领域内勤奋耕耘，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出版了《苗族史》《中国苗族通史》《苗族文化史》《苗族历史探考》《苗族史研究》《湖南通史》（主编古代卷）《湖南民族关系史》等10余部专著。其中，《苗族史》荣获第七届国家图书奖，《湖南通史》获湖南省第三届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苗族通史》获贵州省第八届“五个一工程”优秀著作一等奖，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益。

伍老在退休之后，老骥伏枥，笔耕不辍，发表或出版了众多学术成果，这部70多万字的《湖南文化史》著作的完成，就是伍老近几年来辛勤伏案的心血结晶。伍老这种“不知老之将至”的忘我研究精神和治学态度，是我院和学术界的宝贵精神财富。2014年3月，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许又声同志在全省社科联系统工作会议上，就如何做好新形势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提出要努力打造好“湘”字号社科品牌，希望把湘学研究院建设成为地域文化研究的重要品牌、扩大湖南影响的重要载体、培育湖南人才的重要平台。伍老这部具有开拓性的力作，可以说是我院和我省湘学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对进一步推进湘学研究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也为新形势下推进湖南文化强省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有益的参考资料。

学术研究既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也是一项让人充满乐趣的事业。在伍老以八十高龄完成的这部《湖南文化史》即将付梓之际，我祝愿伍老健康长寿，也希望我们年轻一代的科研人员向伍老学习，为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作出更大贡献。是为序。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刘建武

2015年4月

目 录

绪 论 /001

第一章 湖南远古人类与原始文化 /012

第一节 湖南旧石器文化 /012

第二节 湖南新石器文化 /018

第三节 湖南流传的远古传说 /044

第二章 先楚和楚国时代湖南文化 /056

第一节 商代湖南青铜器文化 /057

第二节 西周湖南青铜器文化 /069

第三节 湖南的楚文化 /081

第四节 湖南“蛮”“濮”族和古越人、“巴人”文化 /106

第三章 秦汉至南北朝湖南文化 /116

第一节 文献与学术 /117

第二节 文学、艺术 /128

第三节 科技和工艺 /143

第四节 史学、地学 /158

第五节 宗教 /162

第六节 风俗 /175

第四章 隋唐五代湖南文化 /179

第一节 教育、科举 /180

第二节 学术与文献编纂 /185

第三节 文学、艺术 /189

第四节 科技与工艺 /216

第五节 宗教 /221

第六节 风俗 /236

第五章 两宋时期湖南文化 /244

第一节 教育与科举 /245

第二节 理学、经学 /253

第三节 文学、艺术 /264

第四节 史、地学和考据、谱牒 /284

第五节 科技与工艺 /292

第六节 宗教 /296

第七节 风俗 /310

第六章 元明时期湖南文化 /323

第一节 教育、科举 /325

第二节 理学、经学 /335

第三节 文学、艺术 /342

第四节 史学、地学及文献刊刻 /370

第五节 科学技术 /383

第六节 宗教 /387

第七节 风俗 /402

第七章 清代前中期湖南文化 /414

第一节 教育与科举 /415

第二节 哲学、经学 /425

第三节 文学、艺术 /429

第四节 史学、地学 /448

第五节 科学技术 /463

第六节 宗教 /469

第七节 风俗 /485

第八章 清代后期（近代）湖南文化 /512

第一节 教育与科举 /513

第二节 近代思潮 /532

第三节 文学、艺术 /550

第四节 经学、史地学 /590

第五节 科技、工艺 /605

第六节 报业与书业 /610

第七节 宗教 /616

第八节 风俗 /639

附 图 /653

后 记 /767

绪 论

湖南文化,或称“湖湘”文化,属特定的地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湖南文化与中原及全国其他地域文化,具有许多共性和共同元素。但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域文化,又必然会有不少自己的特色。而这种特色,则是由湖南所处的自然地理、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以及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发展进程所决定的。

(一)

湖南,地处长江中游南部,东经 $108^{\circ}47'$ ~ $114^{\circ}15'$ 、北纬 $24^{\circ}38'$ ~ $30^{\circ}08'$,属亚热带地区。东西直线距离最宽 667 公里,南北直线距离最长 774 公里,土地面积 21.18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 2.2%,在目前全国 31 个省(区)、市中居第 10 位。据 2010 年人口普查统计,全省人口为 65,683,722 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4.9%,居第七位。其中,除汉族外,还有土家、苗、侗、瑶、回、白、壮、维吾尔等少数民族 657.53 万多人,超过全省总人口的 10%,为中国内地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区。

湖南北部,为洞庭湖平原,与湖北为邻;东以幕阜山、罗霄山脉,与江西交界;西为云贵高原边缘,与贵州、重庆接壤;南有五岭山脉横亘,与两广相衔。全境东、南、西三面环山,南高北低,向中倾斜,朝北开口,形成特有的马蹄形状,自为一体。武陵山脉和雪峰山脉,由西南向东北斜贯其间,成为湘东与湘西两个部分的天然分野。湘中除南岳主峰海拔 1290 米之外,一般为波状起伏的丘陵和河谷盆地,海拔均在 200~500 米。北部以洞庭湖为中心,由冲积平原和浅丘平原组成滨湖盆地,海拔一般在 50 米以下。全境具有山地、丘陵、岗坡、谷地、平原等多种地貌类型,这也就形成湖南自然资源的丰富和多样化。湖南水系发达,湘、资、沅、澧四水由南向北、自西而东,纵贯全境,纳大小

溪河 5000 余条，汇注于洞庭湖和长江，流域总面积为 26.28 万平方公里。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为 17℃ 左右，年平均降水量在 1300 ~ 1600 毫米，全年无霜期约 260 ~ 300 天，年日照时数为 1300 至 1800 小时。这构成湖南气候温和湿润、四季分明、雨水充沛、光热资源丰富等特点，适宜于农耕和各类动植物的生存成长。湖南地下矿藏也相当丰富，特别是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素称“有色金属之乡”。正是这类自然地理特点和具体的生态环境，自古以来为湖南人的生产生活和历史文化的创造发展，提供了空间和条件。

湖南的不同地区，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生存条件存在差异，这直接导致各地区的生活方式和历史文化发展各具特色。如湘北洞庭湖滨和湘、资、沅、澧四水下流平原与低丘地区，土地肥沃，雨量充足，水面宽阔，交通便利，农耕渔业发展条件优越，早在春秋时代即已成楚国粮仓，素有“鱼米之乡”的声誉，是典型的稻作农耕兼渔业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类型；湘中和湘、资二水中游地区，丘陵与河谷盆地相间，主要宜于稻谷农耕，但多种经济作物发展条件亦很优越，而由于地处湖南中部，自古以来即成为湖南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中心；湘西、湘南和湘东山区，又是一种类型，这里山多田少，溪洞纵横，交通阻隔，且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地，靠山吃山，旱土作物和狩猎、林木经济所占比重较大，生产生活方式和历史文化都另具特色。

(二)

目前在湖南境内所发现的人类活动最早的遗迹，属 20 多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这可视为湖南历史的开端。湖南的先民们，同各地各民族的先民一样，曾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从考古文化看，包括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在数十万年间，湖南先民创造了丰富的旧石器文化，并于 1 万年前左右率先发明人工种植稻谷，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原始农耕生活。在新石器时代的数千年中，先民们以简陋的生产工具，同大自然作顽强斗争，艰难地开发三湘大地，创造和发展了原始文化与原始农耕文明，而在某些方面还领先于全国，为中华文化与中华文明的最初缔造作出了贡献。

新石器时代末，大约五六千年前，中国经历了“三皇”“五帝”的传说时代。约公元前 21 世纪，大禹传位于子启，建立中国第一个世袭制的夏王朝。后

在黄河中下游和中原地区，又先后建立商、周两个王朝。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东迁洛阳后，史称东周，进入春秋战国时代。在夏、商、西周三代，湖南虽被《禹贡》列入中国“九州”之“荊州”，中原王朝也多次“南巡”“南征”，华夏炎黄族某些支系在不断南迁，但湖南全境大体仍处“要服”与“荒服”之列，为“蛮夷”民族聚居之地。在这 1000 多年间，湖南各土著族群，从新石器时代逐步过渡到青铜器时代，创造了具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青铜文化。同时商周青铜器大量流入湖南，湖南文化的某些因素也进入北方和中原地区，中原文化和湖南本土文化已开始了交流的进程。

从西周末年和春秋时代开始，楚国兴起于南方，湖南逐步归入楚国的版图，设置黔中郡及临湘（长沙）、舞阳等县邑，此外还有罗子国、麇子国等封君属国，湖南开始有了正式的行政建置和行政管理体制。在此后的数百年间，楚人融合部分当地土著居民成为了湖南境内的主体居民，楚文化在湖南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在沅湘间创作的大量诗篇，长沙楚墓出土的珍稀楚帛书、帛画等，均充分显示了湖南楚文化的成就，对后来的湖湘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在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影响下，湖南土著的“蛮”“濮”和“越”“巴”各族，开始了原始氏族社会解体和进入封建化的过程，各族原有的民族文化也获得了新的发展，并与楚文化一道，共同构成秦汉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湖南古代文化之源。

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和秦、汉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建立后，湖南各民族进入了祖国多民族的大家庭，三湘大地成为中国不可分割与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秦在湖南置长沙、黔中、洞庭等郡及临湘（长沙）、罗、武陵、益阳、湘南、郴、耒阳、零陵等县。两汉时，湖南分置长沙、武陵、桂阳、零陵四郡（国）。另有湘南江华、江永等部分地区，属于苍梧郡。秦汉王朝，特别是两汉，政治上开创和初步发展了国家大一统的局面，全国统一的汉民族得以形成和发展，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空前繁荣，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最初的发展和兴盛时期，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秦汉 400 多年间，由于国家的统一，南北交流的加强，湖南封建经济和文化同样获得显著发展。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数以千计的珍贵文物，充分反映了当时湖南和长沙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水平。正是在此期间，湖南已“华夏化”的楚人，及部分原土著居民与南下的华夏族人逐步融合，形成了湖南的汉民族；同时楚文化和土著民族文化，与中原华夏文化及其他地域文化，相互

吸收与融合，在湖南开始形成具有特色的古代湖湘地域文化。以蔡伦、胡腾等为代表的湖南古代人才，初露头角，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与文治武功，在中国历史发展中作出了贡献。而长沙国太傅贾谊，长沙太守张机，政绩斐然的桂阳太守卫飒、蒧充等，这批早期入湘的中原和外籍名人，又积极促进和影响了湖南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从220年至589年，中国经历了三国、魏晋和南北朝时期。在这数百年间，国家大多处于分裂状态，政局动荡不安，战乱频仍，而北方和中原地区尤甚。但在国家和民族不断动荡、变迁中，周边民族同中原民族、北方民族与南方诸族，相互间的接触、交流与融合，却得到进一步加强，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日益发展壮大，经济社会仍有新的发展，而文化科技方面的发展和成就更为突出。

在三国、魏晋和南北朝时期，最初魏、蜀、吴争夺湖南四郡，又一度以资江为界，湖南东部属吴，西部归蜀汉，而后湖南全境均归入孙吴。西晋曾短期统一。后湖南又依次归于东晋和宋、齐、梁、陈诸王朝。这一时期，由于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重心的逐步南移和北方人口的南迁，湖南相对而言受战祸兵燹较小，社会比较安定，因此湖南经济得到进一步开发和发展，文化方面的发展和进步也较为突出。如，在湖南古代历史上产生了以桓阶、刘巴、蒋琬、黄盖等为代表的第一个人才群，出现了第一位史籍有载和作品传世的诗人阴铿，出现了湖南最早的具有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观点的哲学家罗含，还有一批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颇有影响的“玄学”家、史地学家。道教、佛教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传入湖南，深刻影响了湖湘古代文化的发展。

隋唐五代时期，虽历经农民大起义、安史之乱、藩镇割据以及五代十国的政权更替等，但李唐王朝所建立的全国统一的封建帝国，曾维持了近300年。由于长期政治统一，国势强盛，经济社会和文化获得空前发展，特别是在盛唐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达到了高度繁荣的阶段，创造了中国古代文化一段特别辉煌的历史，对后世影响甚大，以至时至今日，海外仍多习称中国人为“唐人”。

湖南同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在隋唐时代，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古代湖湘文化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诸如欧阳询、欧阳通父子“欧体”书法的创造，湘籍僧人怀素“狂草”的成就，由欧阳询主纂的《艺文类聚》大型类书的问世，刘蛻、李群玉等人的诗词创作，长沙铜官窑瓷器釉下彩技术的发明，佛、道二教在湖南所得到的弘扬和发展等，无不显示出湖南文化在中国古代传统文

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毋庸讳言，与中原及东部地区比较，当时的湖南还存在差距，中原王朝仍视湖南为蛮荒瘴烟之地，故常常成为朝廷“罪臣”贬谪之所。但也正因如此，王昌龄、元结、阳城、刘禹锡、柳宗元等都先后谪迁湖南各地为官；李白的“流放”地“夜郎”地处湘黔边，他两次历游湖湘；韩愈贬连州，与湘南毗连，他一度逗留于湖南；杜甫晚年失意落魄，湖南成其最后的归宿地。这样一批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文豪以至“诗仙”“诗圣”，集聚湖湘，都与湖南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在当地的“兴教”“化俗”及其诗文创作活动，对湖南文化的发展兴盛和风尚传统的演化、提高，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在我国其他文化区域是极为少见的。

五代时期，马殷入据湖南，以潭州（今长沙）为首都建立楚国。这是湖南境内历史上唯一的以长沙为中心所建立的国家政权。在近60年间，马楚政权大体起到了“保境安民”的作用，加之经济方面采取了奖励农桑、注重水利、加强“茶马交易”等诸多措施，文化方面则组建“天策府”，广收人才等，这促使湖南的经济和文化在唐代的基础上，能继续有新的发展。

北宋、南宋时期，是中国也是湖南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时期。宋王朝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是相对弱势的王朝，特别是北方有辽、金政权与之对峙，长期相互争战。但它继“五代十国”分裂之后，重建了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治，推行与民休息、劝课农桑等政策措施，还曾一度进行某些改革，这有利于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而在文化发展方面，还出现了一些繁荣的景象。如“宋词”继“唐诗”而兴起，欧阳修、苏东坡等一批诗文大家的涌现；二程、朱熹等名儒的出世，与“理学”的创立和传播；留名后世的宋代“四大书院”，与书院教育的推广发展等等，均可圈可点。

在两宋时期，湖南随着各地经济得到进一步开发，发展速度的加快，文化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湖南是宋代理学的最初策源地，其开山大师就是湖南道县的周敦颐；继之，胡安国、胡宏父子在湖南讲学传道，朱熹、张栻在湖南的“会讲”和办学兴教，作为理学“南脉”的“湖湘学”开始兴起；书院的发展，“四大书院”中长沙岳麓、衡阳石鼓即居其二。在其他的文化领域，如文学、艺术、经学、史地学、宗教等，宋代湖南也均有足以称道的成就和贡献。此外，由于宋王朝“开梅山”、治理“南北江诸蛮”，对湖南原土著民族地区进行开发，这些土著民族所保持的民族文化，在宋代也开始引起关注。曾为官辰州（治所在今沅陵县）的朱辅就其所见所闻，特撰写《溪蛮丛笑》一书，

第一次系统记述了沅水中上游古“五溪”地区的民族风土人情。

元代，入主中原王朝的蒙古贵族统治者，所奉行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以及经济掠夺政策，对全国和湖南地区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消极影响。但为了维持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在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和元朝前期，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建立行省和完善地方行政体制、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等政策措施，均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元朝统治者并没有完全排斥中国传统文化，如对先朝的某些典章制度，对传统儒学和佛、道二教，以及科举选士等，基本上均加以继承、利用，有的还有所发展完善。这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继续发展还是有利的。而元王朝统治地域空前的扩大，南北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与东西各民族交流的加强，更对湖南和全国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在中国古代文化领域，“元曲”的产生和发展，可与“唐诗”“宋词”媲美；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更是元代的一大贡献；与佛、道二教继续得到发展的同时，西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也开始在中国内地传播，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更为多元化。

古代湖南文化在元代数十年间，也获得了新的发展。宋代列为“四大书院”的岳麓书院和石鼓书院，得到恢复重建，再度兴盛；在文学、史学方面湖南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如翰林学士、编修辽宋金三史的总裁官欧阳玄，即其中杰出代表；“工散曲”的冯子振则是中国南方少有的著名词曲作家；曾世荣在中国传统医学方面的成就和贡献也足以称道。

明王朝继承了元朝的大一统局面，延续了近 300 年的统治。长期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明前期所采取与实行的加强中央集权、完善行省和地方军政体制、整顿吏治、奖励垦荒、劝课农桑、兴学重教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使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获得了新的发展。至明中后期，商品货币经济空前发展起来，在东南地区某些手工行业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在文化领域，诸如各级官学和书院教育的大发展，取代宋“程朱理学”的“阳明学”（“心学”）的创立和传播，《大明会典》、历朝《实录》和《大明一统志》等大型典籍的编纂，宋濂、王祿、方孝孺、李东阳等人的经史著述和古文诗词成就等，在中国文化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元末明初的战乱，曾造成湖南地区人口的大变迁。原汉唐以来的土著居民大量流失，江西、江浙等地人口大批迁入，史称“江西填湖南”。这些外地移民的进入，对于湖南经济的开发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影响甚大。近代学者谭其

骧、林增平都曾注意到“湖南人”的性格和湖南文化中这种“移民”因素。在明代，湖南人口和耕地面积都有较大增加，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和粮食生产获得很大发展，以至在民间产生了“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文化领域，官学和书院教育较宋元更有发展，经过科举进入仕途的人才较宋元大为增多；刘三吾、茹瑺、夏原吉、李东阳、杨一清等一大批人才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不仅是明代官高位显的政治人物，而且也都是湖南颇有成就的文学家、经史学者；湖南长沙等地和岳麓等书院，是明代大儒王阳明及王门弟子传播和弘扬“阳明学”的重要场所；明代《实录》《会典》等典籍的编纂，都无不汇注了湘籍人士的大量心血。进入明代后，道教趋于衰落，湖南与全国均如此，但佛教获得继续发展，伊斯兰教也开始在湖南传播。由于土司制度的实施，特别是对“苗疆”的武力镇压和“边墙”封锁，湖南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受到消极影响。但在明代数百年间，随着宋元以来土家、苗、侗、瑶等单一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湖南境内的这些民族的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也继续得到传承和发展。

由满族贵族建立的清王朝取代明王朝后，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在明代逐步形成的那种发展势头，曾一度受阻。但在清代的前中期，清朝统治者较有作为，特别是康熙、雍正和乾隆在位时，文治武功达到鼎盛时期，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封建经济得到继续独立的发展。文化发展方面，大规模的“文字狱”曾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但整体上看满族统治者还是注重吸收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推崇儒学，重视教育，所以中国古代文化又再次获得新的发展，经历了它最后的繁荣时期。

在李自成、张献忠余部和南明势力的反抗，以及吴三桂的叛乱相继平定之后，湖南社会一直相对比较安定，经济又有所发展，古代湖南文化也再次呈现某种兴盛繁荣的局面。各级儒学和书院的增修、新建为数不少，各类义学的大量设置，尤其是雍正时湖南单独设立行省与湖南、湖北乡试分闱之后，学校教育和科举业加速发展，湘籍进士、举人大量增加。湖南的传统经学和以“经世致用”为主旨的“湖湘学”、史地学、古文诗词创作、书画艺术，以及医学等，在清前中期均得到了发展。王夫之的哲学、史学巨著主要都是在清前期完成的。此后，李文炤、王文清、陈鹏年、罗典、黄本骥、陶澍等，湖南一批儒士名臣和汉学家、诗文作家、史地学者，还有画家髡残、医学家周学霆等，在清前中期相继著名于世，他们的学术成就和传世作品，无不促进了湖南文化的发展，